

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笔谈(之四)

文学破圈的潜台词

□石华鹏

文学破圈,任何时代都可能面对的话题

纯文学破圈、出圈的话题由来已久,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这一话题表达了人们对文学内部生产固化僵化的焦虑和文学外部传播深度广度的渴望。

这种焦虑和渴望,几乎贯穿了文学活动——构思、写作、发表、评价、传播——的全过程。如果再细想一下,这两个问题——破文学的艺术之圈与破文学的传播之圈——似乎如幽灵一般盘桓在现代中国文学百年的纵深之处。比如,五四前后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破的是文学的“媚雅”之圈,强调文学的大众化和启蒙意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破的是文艺脱离群众之圈,强调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破的是小说技艺形式单一的圈,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新时代的文艺工作强调破圈,目的是推动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等等。

故而,从本质上说,文学破圈是文学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面对的话题,换句话说,文学在各个时代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势必会遭遇“圈子之困”,文学破圈是对“圈子之困”的某种反思和突围,也是文学之树常青的“法宝”。

我们今日重提这一话题,盖因时代巨变、媒介革新、文化转型给文学这门古老行当的存续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焦虑和渴望。“和物体相依为命的时代过渡到和信息相依为命的时代”(韩炳哲语),信息巨大的增量和流量让文学的信息(知识、见识和精神)传递本质在这个时代显得贫乏,文学的想象力日渐落后于火热的现实。从纸质媒介过渡到数字媒介,传统文学在文字和纸张之间建立起的亲密无间的二维关系被多维的数字媒介弄得有些黯淡无色,纯文学读者锐减。文字系统所创造的文化正逐渐被人工智能系统所创造的文化侵蚀,由媒介平台的模型和代码系统构造的“真实世界”正在挑战文学所虚构和描摹的真实世界。与流行的社交平台及短视频相比,今天的纯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时代文化的建构呢?新时代的诸多变化,似乎让纯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圈子之困”,如何破圈?——这一问题顺势而来,不得不去面对。

文学破圈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话题,因为文学之圈,圈圈相套,要破壁的不是单一的圈,它更像一个文学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破一圈不足以铸造新文学。

如果我们将其这一复杂圈子剖裂开来,文学破圈、出圈至少包含这样几方面:

一、从作者角度看,要破写作内部的艺术和技术之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所处的中国社会建设的新时代,一位写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时代本质和潮流,能深刻地洞察人性的深度,能多敏锐地感觉和直觉现实中的人和事,当然还有多大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转化能力,将决定一个写作者能否突破旧有的写作经验形成的技术和艺术上的圈套,能否在自己的时代脱颖而出。

二、从出版者角度看,期刊出版和出版社出版构成文学出版的两大传统阵营。与网络平台推送作品的便捷相比,它们在保持文学作品的水准尊严和尽可能扩大传播范围间苦苦支撑,它们要使最好的作品得以最大范围地传播,诸多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想尽各种招儿,加强编辑策划,在传播上动用网络上的各种热门平台“广而告之”。

三、从读者角度看,纯文学要破的是市场之圈、社会影响力之圈。争取更多的读者,尽可能地被市场接受,意味着纯文学社会影响力的实现,但对新一代的“网生代”读者来说,网络文学培养的审美习惯和阅读习惯与纯文学有明显差异,这个圈如何突破,成为时代课题。

四、从评论者角度看,文学破圈要破的是建立文学评论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信任感和权威性。“学院批评”的亲力和“媒介批评”的非功利性亟须建设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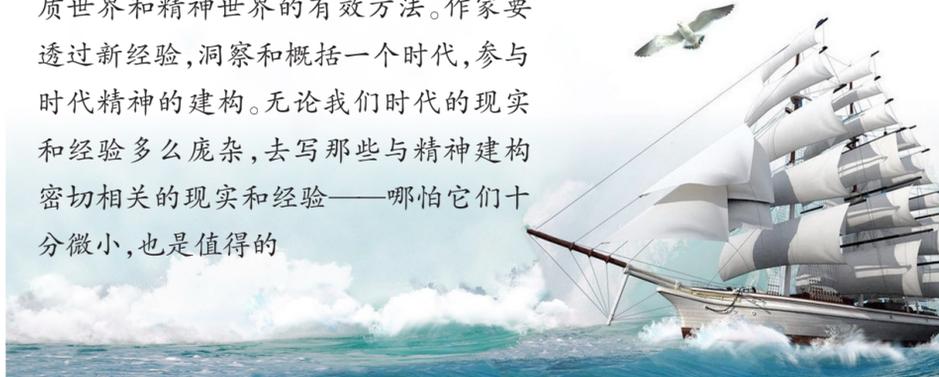
文学破圈、出圈,破的是自我的藩篱,出的是逼仄的传播空间,目的是让一个时代的文学走进更多人的内心。

文学破圈的那只利剑,是打造精品力作

“文学已死”“小说已死”的论调,时不时冒出来。但我们知道,文学不会死,小说不会死,死掉的是无生命力的、被读者抛弃的文学、小说。一位写作者的破圈行为当从拥有破圈意识开始,不断思考并付诸实践,突破写作上固化和僵化的路径。

为了与网络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奇信息争夺读者的注意力,美国编剧詹姆斯·弗雷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劲爆小说”。他在《让劲爆小说飞起来》一书中描绘了“劲爆小说”的基本元素:它有强大的吸引力,故事富有戏剧性;它触动读者的身心,感人或者令人愉悦;它道出人类社会重

那些伟大的作品启示我们,对现实和经验的沉淀和提炼,是抵达真实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有效方法。作家要透过新经验,洞察和概括一个时代,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无论我们时代的现实和经验多么庞杂,去写那些与精神建构密切相关的现实和经验——哪怕它们十分微小,也是值得的



要的东西,或明或暗;它的表达简洁、准确和美。弗雷把“强大的吸引力”置于“劲爆小说”的首位,实际上是在破除旧有小说以及旧有的小说理念那种繁复、冗长、乏味之圈,但又不失小说追求的精神高度以及美感。

或许,那种因为思想性、艺术性兼具而产生强大吸引力的“劲爆作品”,会成为我们纯文学在网络时代开辟新疆域的有效“武器”,成为文学破圈的那只利剑。“劲爆作品”从哪里来呢?这需要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路向。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它与过去的文学有了一些明显的差异。小说家毕飞宇认为:“新一代的作家、新一代的写作者,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的审美需要,跟我们过去的文学序列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新路向“新”在哪里?“新”在变化之中:文学观念在变化——探求一种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中间道路;写作主体在变化——“作家”这一职业开始泛化和非专业化,写作者人数大量增长;文学形态在变化——新旧媒体在交融,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界限在消失,科技因素对文学影响越来越大。

文学破圈有赖于应和文学发展路向上的“新”,新即变化,与过去文学序列所发生的变化,应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作为确立新的宏观方向。旧有的写作思维方式和表达模式,该舍弃的便舍弃,该调整的便调整。从文学内部来讲,如何有效处理新经验,成为这个时代文学写作的最大难处。本雅明认为经验的贬值给小说带来了危机。这个观点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经验的泛滥侵占了小说的自有空间,小说的娱乐功能和知识功能弱化;二是小说对经验的处理呈现出麻木性和无力感,在庞大的经验面前有些手足无措。那些伟大的作品启示我们,对现实和经验的沉淀和提炼,是抵达真实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有效方法。作家要透过新经验,洞察和概括一个时代,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无论我们时代的现实和经验多么庞杂,去写那些与精神建构密切相关的现实和经验——哪怕它们十分微小,也是值得的。如果那些现实和经验与精神建构无关,即使它们再高大,也是不值得去写的。

在今天的现实之下,是与“旧”告别——旧的乡村、旧的居所、逝去的故人;是与“新”相遇——新的城市、新的居所、新的旁人。这种告别与相遇的变化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价值,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意义。

文学在艺术和技术上的破圈,除了去拥抱这种“新”,还要质疑某种“旧”。比如,旧有的长篇小说是否还能适应今天的时代?它如何才能囊括当下庞大而复杂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这个时代的表达或许需要一种创新的长篇文体,而这种文体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的文学变迁轨迹已经见证过史诗和戏剧的衰落,或许它正在见证长篇小说的某种变异。比如网络小说已经出现了字数超过千万的超级篇幅。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篇幅的延长?德国汉学家顾彬明确表示:“长篇小说的时代过去了,应该回到中短篇小说”,“集中于一个人的灵魂”。他的理由是,长篇小说是一种对整体的渴望,而现代性之一,是全体的丢失,中心的损失。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奉劝那些作者不要再野心勃勃地试图向读者展示“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描述“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感受”上。这两位评论家只是预言托尔斯泰式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在今天

的失败,但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式。“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在这个节骨点上,时代之大

作或许会与一种新的表达模式共同诞生。

文学破圈,需打通纯文学与市场的边界

作家余江涛说过一段让写作者共情的话:“从事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有巨大的心力和必需的物力,网上许多人似乎都能写,都在写,阅读的流量压力远远超过以往,没有被知晓就被遗忘的孤独感一直会伴随着线上、尤其是线下的许多作家。我虽然至今都抱有拥抱文学的幻想,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徘徊不前,明年不进入就彻底退却了。”

“没有被知晓就被遗忘的孤独感”——宛如写作者内心的“魔鬼”,它随时都会吞噬掉写作者的信心,让写作行为难以为继。我们不禁会问,在今天这个处处充满吸引和诱惑的时代,对文学怀抱的理想和幻想在这种“孤独感”中究竟能支撑多久?余江涛给出的答案是:明年,“一直徘徊不前,明年不进入就彻底退却了。”

这当然是一个感伤的答案,所以,尽快被行业圈内知晓,将是继续写作的一大动力。这是文学破传播之圈的第一步——在圈内获得认可和名声。不过行内人都知道,这何其难也!要么在文体探索上作出贡献,要么写出了个性十足且保持艺术水准的作品,要么作品在受人尊敬的评论家和作家那里得到赞许,要么频繁获奖尤其获得国家级大奖,你才有可能被圈内同行知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1980年代到2010年代——作家的圈内名声大多来自文学刊物,名刊连续推出一位作家的作品,这个作家很快就被同行知晓了。但近十年来,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刊物很难再让一个作家一举成名圈内知。一个作家在圈内获得认可或被熟知,靠单一的渠道已经很难达成,期刊的展示、网络的点击率和好评率、文学大家的举荐、各类奖项的加持,多方面合力方能让一个写作者在获得圈内名声建立起写作的信心和并不丰厚的成就感。近几年在圈内获得名声的福建作家陈春成,大致走的这条路子。

文学的传播是件很玄妙的事儿,圈内知名度并不代表市场认可度,有的作家名声很大,但书籍销量不大。可以说,圈内知名度只是破了文学传播之圈的一个内圈,它的外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圈——读者阅读市场。打通纯文学与阅读市场的边界,才是破文学传播之圈的美丽目标。

当代文坛近几年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当数“新东北作家群”的出现。“新东北作家群”在文学与边界外的成功突围,被媒体称为“真正打通纯文学与市场的边界,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获得影响力”。他们的破圈之路,可以简化为名刊认可、网络媒体推波助澜、影视改编加持,他们的声名和作品走向了更广阔空间。

既保持纯文学品质,又获得市场传播的认可,这是当下纯文学破圈的价值追求。不过,在文学品质与大市场之间,我更欣赏马尔克斯的态度。据说当年马尔克斯看到自己的《百年孤独》在地铁口像热狗一样受欢迎、大卖时,他说了一句话:“我的小说不应该有这么多读者。”哈哈,这可能是一句马尔克斯面对作品破圈时的一次“凡尔赛”吧。

诗人汤养宗说:“文学是我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业,也是最难成功的事业。”如果文学破圈算是某种成功的话,那它实在太难了。当然,或许正因为难,文学才有如此的魅力和吸引力吧。

(作者系《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

综述

9月18日至20日,“新媒体语境·跨学科视野——第十一届中国当代诗学论坛”在江苏扬州举行。该论坛由谢冕、屠岸等作为召集人于2007年创设,曾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天津、香港、广州、台湾等地成功举办了十届。本届论坛是对前十届论坛的延续,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由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大学中国诗歌研究所承办,扬州虹桥书院、运河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协办。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多个高校、研究单位、学术期刊单位的近百位学者齐聚扬州,就当代新诗的发展趋势和研究动态进行深入研究。扬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文明,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扬州大学教授叶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顾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扬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定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通过视频致辞。

媒介技术的变革,特别是AI智能的发展,为新诗写作和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上海大学教授钱文亮谈到,尽管“AI诗人”的语言修辞可能超过很多初级写作者,但它们终究只是语言的“搬运工”,仍然难以写出超越人类的诗歌。不过,这仍然带给我们的诗歌写作很多省思。当下的诗歌写作者,仅仅依靠对前人既有诗歌文本的高强度学习、模仿或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朝向未来的人类诗歌写作,需要经验的、直觉的、知性的甚至是超验的生命感受,也需要现实感、历史感和神圣感、神秘感的交汇、共振、整合。《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认为,随着技术的升级甚至有可能出现“情感机器”“灵魂机器”,人工智能写作将通过过量的积累最后达到质变并不断接近人类的写作思维,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人类。从愿景和未来发展来看,我们对人工智能诗歌不必过于不满或不屑。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清晰地知道,无论是人工智能写作还是人类的写作,最终面对的就不是机器属性,而是人类的精神属性和存在的终极命题。西南大学教授蒋登科认为,自媒体的涌现让诗歌发表的门槛变低了,诗人获得了更大的发表自由。这让海量的诗歌涌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纸质刊物有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选出真正优秀的诗作,让读者在泥沙俱下的诗歌海洋中更便捷地找到好的精神食粮。扬州大学教授罗小凤谈到,在新媒体时代,诗歌创作要警惕娱乐化、消费化、符号化的倾向。诗人要拒绝作为“出场符号”而出场,给予“诗”最基本的尊重,回到真正的“诗”。

新诗研究想要获得新的拓展,必须突破学科分工过细的问题。新诗是在古今、中外诸多因素的交汇中诞生的。因此,很多与会者都谈到了打破“古今中外”界限的问题。暨南大学教授赵黎明以叶维廉的“模子”理论为例谈到,叶维廉的诗学愿景是在中/古与今/今之间,发明出一种既包括古今中外各种因子又不同于这些元素的“第三种诗”。其从异质诗学互鉴中发明自身传统、从多种诗学资源中寻求公约数的探索,为中外文学关系处理及中国新文学健康生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西南大学教授李心释关注到,很多学者以西方的视野去研究“古典诗的现代性”。但他认为,国内学界所谓“古典诗的现代性”,是西方现代性视角在中国古典诗上的投影。对中国古典诗之现代性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它的现代阐释的可行性的否定,对古典诗的现代阐释也不等于现代性阐释。南开大学教授卢植将“异国体验”或“文化旅行”作为研究方法,持续观照新诗域外抒写的意义乃至走向。他认为,海外经历不仅增长了诗人的学识,还磨炼了他们对于多元文化样态的感知能力,激发了行旅主体的思想演进和观念更新。武汉大学教授方长安说,百年新诗创作史与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没有新诗的传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诗创作的不断突围与发展,但是既有的文学史、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包括新诗传播接受内容。基于这一状况,应重建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基点与主轴,以传播接受事实为视野与依据的开阔的新诗史。西安财经大学教授沈奇聚聚焦建筑、茶道与诗歌之间的内在相似性,浙江大学教授蔡天聚聚焦拼贴艺术的发展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晓娅、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赵思运结合翟永明的长诗及题材画作、戏剧作品,谈到了诗意在艺术中的跨越问题……这些发言都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意识”。

在本届论坛中,与会者还深入探讨了一些不大为人们所关注的诗人诗作和诗学问题。比如,澳门大学教授朱寿桐以《小诗磨坊作品集》为例,探讨了小诗写作的传统资源和创作特点。岭南师范学院教授张德明以“如雷贯耳的‘陌生人’”为题,对章明其人其文进行详细梳理。在19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中,章明以那篇著名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促成了“朦胧诗”命名的诞生。不过,关于章明,诗歌界除了知道他写过这篇引发争议的诗歌论文,大多数人对他的其他情况并不了解和熟悉。张德明对章明的生平经历和著述文学加以细致考证,并试图探讨这篇论文对朦胧诗论争的重要意义。扬州大学博士生吴瑶关注到作家汪曾祺的“诗人身份”,认为他的诗歌创作注重色彩,在“感觉诗学”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对其小说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牛津大学博士生王彻之聚焦21世纪汉语诗歌中的“愉悦”问题。他认为,自现代汉语新诗发轫开始,“愉悦”作为一种审美向度,以及一种诗歌的写作伦理概念,长期处于被压抑和曲解的境况中。因此,有必要回溯当代诗对诗歌“愉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厘清“愉悦”涵义的发展和变异,分析新世纪以来当代汉诗对诗之“愉悦”的贡献,以及其中包含的问题与可能性。

(黄尚恩)

第十一届中国当代诗学论坛聚焦新媒体语境下诗学的跨学科发展

给诗最基本的尊重,回到真正的诗

“中国作家运河行”采访活动走进苏州

本报讯 9月3日,由“中国作家运河行”组委会主办、中国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作家运河行·走进运河城市”走进江苏苏州。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主席陈国栋、中国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彭健,以及20余位作家参加活动。

作为中国大运河重要的文化古城,苏州共有4条运河故道和7个段落列入申遗名录,也是运河沿线城市中唯一以古城概念申遗的城市。苏州市姑苏区是大运河文化带上的重要坐标,大运河孕育了姑苏人家的特色风貌和生活方式,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盘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等地,作家们深入了解苏州人文历史和古城保护情况,体悟内蕴深厚的运河文化。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推进苏州古城保护和运河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今后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创作有温度、有深度、接地气的作品,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创新作出应有贡献。

专家观摩研讨电影《孔秀》

本报讯 9月17日,电影《孔秀》在河北石家庄举行试映观摩研讨会。来自河北省作协、河北省影协、石家庄市文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导演王超、主演沈诗雨到场交流。

《孔秀》改编自河北作家张秀珍的长篇小说《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印染厂普通女工孔秀凭借勤劳、坚韧、奋进的优秀品格,自强不息、努力学习,抚养三个孩子成人,并在繁重的车间工作之余,从文学中汲取精神养分,成为作家的故事。

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表示,《孔秀》是一部生动展现文学与影视“双向奔赴”的作品,影片以不着痕迹的生活化表达讲述了一个普通女性在时代变迁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富有感染力的情节让观众感受到文学的美好、电影的魅力。与会专家认为,电影用富于诗意的叙事手法和朴素深沉的艺术表达,将一位女性的励志故事真实呈现在大银幕上,饱含女性力量,是一部直击心灵、富有感染力的佳作。

据悉,影片目前正在筹备全国公映事宜,将尽快与观众见面。

(刘鹏波)

诗集《冰子闲吟集》首发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9月16日,“人间仙境是吾乡——梁景启诗集《冰子闲吟集》新书发布暨朗读会”在北京雍和书院举行。李文朝、林峰、李凤禹等书面致辞,陈国栋、王改正、赵腊平等30多位诗人、作家、朗诵艺术家参加活动。

梁景启是北京市平谷区人,北京作协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长期编辑《美丽平谷》杂志,以传统诗词等形式来书写家乡新变。其诗集《冰子闲吟集》近期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该书按文体分为五绝、五律、七绝、七律、词、联六个部分,收录了诗人近年来创作的诗、词、联等计197首(副)。与会者谈到,《冰子闲吟集》中的作品大多以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素材为题材,寄托了诗人对时代、现实、亲情、友情等命题的思索。诗人用精练的诗词语言,描写家乡的自然风物和社会人事,体现了诗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朗确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联原副主席朗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9月10日在西双版纳逝世,享年77岁。

朗确,哈尼族,中共党员。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最后的鹿园》,小说集《山里女人》《没有太阳的山林》《女儿山》,中篇小说《太阳女》《阿耶》《情韵》,散文《茶山新曲》等。曾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